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童年旧事】	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白 羽
【亡灵祭坛】	彭康校长之死	交大人物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中）	阎 淮
【各抒己见】	对施害者和受害者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舒 声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童年旧事】

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 白 羽 •

北京有着全国最多的军队总部、政务机关、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这些大院从历史、地理和人口结构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格局与气质，这里是北京大院人的心灵故乡。

有些时光，有些地方，终将与主义、理想无关，只因我们曾经走过，它便成了故乡。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新太平胡同11号（史称太平胡同3号）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过100多户北影厂及电影界其它单位的职工，还有过一个培育了大量电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儿园。

记得1958年我随父母从长影迁居北京时第一次见到院子大门，门口的石头台阶与我的视线平行，颇显伟岸；其实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过当时4岁的我个子太小而已。我住进大院后的最初几年可谓幸福成长，其间有太多的温馨画面与我终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临的文革风暴改变了一切。

1、风暴袭来

第一次冲击在1966年8月的一个夏夜，北影厂革委会派来程汉琨（电影《红色背篓》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开大会。会前高唱革命歌曲，气氛诡异，与文革前历次居民大会不同，我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感。虽然当时已有各种政治传言，但刚满12岁的我却从未亲历过这种场面。

程汉琨会上宣布，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帮分子”，以后要监视他们的言行并组织批判，亲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黑帮名单计有：谢添（导演）及夫人杨雪明（演员）、陈怀恺（导演）及夫人刘彦弛（编辑）、桑夫（导演）及夫人赵莹（导演）、赵子岳（演员）及夫

人张健（老干部）、池宁（美术师）及夫人徐清扬（干部）、魏荣（导演）及夫人孔召召（干部）、鲁军（编剧）、任颖（王大化烈士遗孀，编辑）、韩郊（演员）、陈晨（摄影师）、李莉（家母，幼儿园长）等人。

我当即像被打闷棍，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其实，当场宣布的“黑帮分子”一个也没到会，这个大会好像纯粹为了动员家属。但是，从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们忽然变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受尽夸奖的“好孩子”忽然变成了受到歧视的“狗崽子”，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一时难以承受，虽然别的“黑帮子女”好像没有我这么害怕和痛苦。

紧接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散会后，有人路过我家窗口时高声议论说我父亲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职影协而不属于北影管辖故未直接波及）。父母闻听无言，却忐忑以目；我则一夜难眠。

翌日清晨，“黑帮分子”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出来打扫卫生。他们神情阴郁，忍辱负重，形同犯人。从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们一直处于备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间变成了被人鄙视的“贱民”，其中还有自己的母亲，这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创伤。如果说后来我的性格、心态有时扭曲的话，这“慢性病”则一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记得劳动中家母遭到申斥时意图反驳，邻居赵润波（马尔路导演之妻）猛使眼色让她忍耐，这同情的一瞥强烈慰藉和感动了我，使我刹那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并非社会常态。

随后，抄家开始了！北影革委会派人把各家各户的书籍查抄出来，在大院中间堆成一座两米高的书山纵火焚烧，顿时烈焰蒸腾、红光灼人，整整烧了一昼夜。其后又陆续抄检出来的书籍则堆满了一间空房，最终成了大院少年们破窗而入的“阅览室”。

我家的上千部藏书因我父亲对来说由影协负责处理而幸免于难。所有“黑帮”家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黑色对联。我们目睹了山西外调人员审讯赵子岳的情景，面对厉声呵斥，这位“老革命”艺术家不温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缓慢语调从容“交待”延安整风和晋绥根据地的陈年往事，让人大开眼界。

一天，四中红卫兵来抄陈怀恺家，因父母已关“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从小荣誉缠身的陈凯歌（陈怀恺之子）时年14岁，屈辱得泪流满面。后来，徐清扬不堪忍受悬梁自尽了，全院充满了恐怖气氛，她的子女则毕生遭受着心灵阴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颖之子，新影厂长）率领十几个钢铁学院的老红卫兵来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干部。走后不久，北影革委会赶来几个人寻衅滋事，受到贾清娟（老干部，医生）之女的痛斥。他们不识时务地质问：你是什么人？身着旧军装的贾女响亮答道：人大附中红卫兵战士刘延梨！

当时老红卫兵很少，但却声势烜赫，只有干部子女有资格参加。北影来人面面相觑，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们“黑帮子女”无不拍手称快！为了打击“黑帮”的气焰，北影革委会决定在大院召开一次批斗大会。获悉消息，父母为了使我不受刺激，送我到一亲戚家暂避。

在东城区干面胡同亲戚家避居时正值“红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宝权（翻译家）、凌子风（导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许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被挂牌游斗、殴

打、剃“阴阳头”，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旧”、砸招牌、毁店铺、剃皮鞋、剪头发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会派人找到我亲戚家，令我回院“闹革命”。

回来后，“大串联”开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大人们还要为外地学生准备每日饭菜，一律不收任何费用。

一天，新影干部陈光告诉我们，毛泽东要环城接见红卫兵。我和几个同伴马上徒步赶到了北太平庄，外地学生已经在马路两旁席地坐好，中间留出汽车通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歌曲、高呼口号，我们则站在他们后边焦急等待。

车队终于来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站在新出产的212吉普车上，车子缓缓驶过，与我们相隔十米左右。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挥动绿军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红。

我感觉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种神情并不是照片中常见的和蔼，用几十年后李银桥（卫士长）的一个词汇来形容最为准确：冷傲。

我们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身边声音更为响亮的是马骏（马尔路之子，演员），我从来没听他这么大声喊过。林彪站在第二辆车上，频频挥动《毛主席语录》，笑容可掬。我还看到坐在后面车上的刘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后，我为此写了长篇日记。

此时，院子里的大、中学生早已去外地串联，我们小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无奈改为下乡劳动。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宁（池宁之子，摄影师）、吴京京（科影厂长吴纯一之子，制片主任）、刘平梨（贾清娟之子、石油部干部）、韩小京（会计师韩叔耀之子，北影财务处长）、李京（陈光之子，教师）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结队出发了。

我们刚出德胜门就饿了，在一家餐馆排队买粉肠，觉得太好吃了。天黑后，我们到达大屯公社大屯大队的大屯生产队，即现在高楼林立的天通苑一带，那时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父母们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乡对我们格外热情。

一位老大爷照顾我们食宿，每晚和我们住在一起，特别注意火炉，他总爱叨唠：“可别中了煤毒！”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收割蔬菜并运进地窖储藏，当然少不了偷吃新鲜的胡萝卜和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长，家长们终因放不下心而把我们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11、12、13期社论，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资反”路线），“揪出坏人一小撮，保护干部一大片”。中、低层干部们奔走相告，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贾清娟骑着自行车在北影厂区内围着囚禁张海默（剧作家）的楼房高喊：海默——干部解放了！你要坚持住！然而，海默已经被打死了。贾清娟和任颖每日来我家向我母亲传播新消息，她们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泽东主义公社”，我父亲则参加了影协的“求实战斗组”。

## 2、文艺界的派别与社会上不同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北影厂乃至文艺界的派别及其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正好相反。社会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时掌权的各级领导造反，社会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

天”。文艺界的造反派则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参加者多为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文艺界的保皇派则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参加者多为工人——原因在于领导文艺界“十七年”的是周扬（文化部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肖望东（文化部代部长）；领导北影厂“十七年”的是汪洋（厂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许里（党委书记）。北影厂的造反派叫“毛泽东主义公社”，保皇派叫“毛泽东思想大学”；后来公社改称“红北影”，大学改称“新北影”。

整个文艺界的保皇派统称“砸三旧”派；造反派虽不明言，却在感情上与“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藕断丝连，其四大领袖则是“彭、刘、叶、石”：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宁（彭绍辉之子，导演）、中央音乐学院的刘诗昆（叶剑英女婿，音乐家）、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导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洗（石羽之子，演员）。

### 3、乱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当年的批“资反”路线曾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帮的大批中、低层干部暂时被“解放”了，加入了群众组织，开始参与文革；而他们的子女则暂时摆脱了“狗崽子”的身份，与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当时我们流着眼泪、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很快，我和池小宁、桑强（桑夫之子，摄影师）等人组成了“追穷寇战斗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宁之女，画家）等人组成了“小红军战斗组”，谢绵绵（谢添之女）和桑鲜鲜（桑夫之女）组成了“全无敌战斗组”。我们三个战斗组联合行动，在大院和北影厂贴出了大字标语：“程汉琨必须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检查！”还有许多大字报（不过我们始终没找到程汉琨本人）；我们在北影厂，与赶来支持“毛泽东思想大学”的清华大学“小学生战斗组”的大学生们辩论；我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销售《红北影》报纸——内容都是宣传我们这一派观点的；我还一个人夜间提着浆糊桶，沿街张贴传单、标语和报纸。

某夜，我在北海北门贴传单时看到一群人贴大标语，落款是“五一六兵团”，不久他们就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了。我们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开的“毛泽东主义公社”全体大会。会前照例由秦志钰（演员）指挥唱歌，她时年二十五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干练，英姿飒爽；后来我曾随母亲参加了她和石洗的婚礼。

一次批斗许里时，当史大同（史东山导演之女，编辑）揭露革委会曾把大多数干部内定为右派或中右时，全场群情激愤，尤其是带领大家喊口号的邢荣（美术）激情澎湃。这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几个女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散会，但被人多势众的北影“公社”赶了出去。

会后，于洋、于萍等演员登台表演了文艺节目，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诗朗诵《造反派的脾气》，整场演出由我们大院的小美女龙莉（龙大夫之女）报幕。

某日，“公社”的几十人被“大学”召集来的几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团”包围在北影玻璃大楼内，几乎发生武斗，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属赶去时，与“革造”对立的“北京红色造反者兵团”的上千人已经解救出他们，结果有惊无险。

那些年，孩子们与家长属于同一派别，“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战斗，我则整天为“公社”激动万分。一次，我钻进了北影“遵义兵团”（第三派）几十人的辩论会场，因为个子

不高，遂站到椅子上与大人们辩论；忽然没站稳，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场立即噤声，全都转头看我，继而把我哄将出去。

然而，当时的我们毕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时间还是结伴游戏。刚一听说“停课闹革命”、无限期放假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高喊：“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岁！”几年间，我们游泳、滑冰、田间捕蛙、果园偷桃、城墙嬉戏、买月票乘车兜风、骑自行车横行街巷……

印象最深的是陈凯歌、田壮壮等中学生接管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和游泳场，我们这些小学生负责监视游泳池的治安状况；一旦发现有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迅即报告中学生，他们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内“教训”。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马上又用“打流氓没错”的“道理”说服自己，那时许多青少年的变态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有时也怀念文革前，便设法找来老唱片偷听，《天鹅湖》等古典音乐把我们带入远离现实的美妙仙境，但同时我们又得常常告诫自己那种美妙的境界其实是“罪恶”的禁区，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了某种轻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

再后来，北影厂进驻了军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别斗争逐渐结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筹拍样板戏电影。

北影宿舍的大孩子们陆续上山下乡，其中韩小顺（韩郊之子）在陕北延安坠崖身亡。我们这些小學生则进入了中学……

□ 原载《新三届》网站

~~~~~

## 【亡灵祭坛】

### 彭康校长之死

• 交大人物 •

彭康，既是交通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首任校长。从这个意义来说，其在交通大学长校7年，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各自独立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后，在西交长校9年，直至离世。所以，写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无论如何绕不开彭康。彭康之死，成为中国教育史、西安交通大学史上一个永远的痛和伤痕。

彭康（1901年8月—1968年3月），字子劼，江西省上栗县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彭康是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1952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6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并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掌校期间，交通大学经历了建国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交通大学西迁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1968年3月，彭康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6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交大举行了“彭康同志追悼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由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主持，胡耀邦等送了花圈。

#### ◇ 在劫难逃：浩劫当中大学校长的整体蒙难

人群一旦疯狂，往往不受控制，今天的世界是这样，比如多年前发泄对日情绪的游行忽然就演变为打砸同胞及其资产的动荡。当年的世界也是这样。“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贵为最高指示，然而悲剧如浩浩大江无法阻挡。

运动从1966年5月发起。时间未久，6月1日，北大聂元梓这个混蛋就写出大字报把校长陆平揪下马来。于是，随行就市，大学陷入重灾区。有人做过统计，除了人大吴玉章、北师大陈垣、复旦陈望道、华师大孟宪承等人因年事已高实际为“挂名”校长外，其余的大学校长几乎没有例外地受到冲击：学生造反到上级定罪到群众批斗，肉体和精神遭受极大的摧残，妻子受到连累，于是有人蹲牛棚，有人自杀，有人则被杀。而在运动中被打倒最早、迫害最烈的大学校长们，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成为解放最晚的人，也是文革浩劫中蒙难最深的一群人。而由于这些先生往往蒙尘在自己的学生之手，这给历史留下了极大的不堪和尴尬。让很多人终生无法释怀，永远无法自白。

因此，彭康之死，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并且不是孤案。然而，彭康之死又有很多遗憾，一个是批斗他的人本意并不想要他死，另一个他很可能是在拖拽和抬送中被自己的风纪扣窒息死亡的。这样我们更加心痛不已。

#### ◇ 根据当事人回忆——

由于1968年彭康去世前是我们电制63班负责看管的，而我，因缘际遇恰巧亲历了这个事件，所以有许多同学多次问我彭康校长去世的前后经过。这触痛了我本不愿回忆却抹之不去的记忆，本不想说却不得不说。

和一般同学一样，我与彭康校长并不熟悉，进校后，听高年级同学盛说他革命时的英勇故事和迁校中事实求实的作风，从而成为我崇拜的英雄。那时，交大青年学子因为有彭康这样的校长而自豪。文革开始后，运动的洪涛凶猛几至疯狂，听说彭康校长也被批斗了几次。到了68年，大多数同学逐渐看清了所谓的反修防修的斗争的真面目，厌倦了揭批斗争的无聊活动，文革初期那股狠毒与残暴劲逐渐消退。校园里已经没有运动之初那种三天两头抓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事了，彭康校长也由校革委会安排电制63班的同学给“保护”起来。参加“保护”小组的同学全是挑选出来的“红卫兵”。我出身不好，自然没有这份资格，托了组长照顾，在后期才得以挤进这支革命队伍。

为什么我要硬挤进去干那本不属自己能干的事情呢？三年级开学时，俄语老师通知我可以开第二门外语，没想到文革暴风骤雨突如其来，二外开不成了。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想彭康校长已经没有多少事了，如果能跟着他学点日语，总比整天学毛选强。于是挤进“保护”彭康的小组。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心强不如命强，我去了大约只有一周时间，与彭康校长话没说上一句，他就被整死了。

那是个暮春时节，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竞生的时节，可是冬天的寒气仍然浓厚。彭康校长被整死的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见小组的同学都在睡觉，彭康校长却不见了。去问组长，组长说是交大抗校的红卫兵昨晚送来了条子，要拉彭康校长去毛主席像前请罪，今早他

们来人自行拉走了。我无聊地在门外转圈，周围静静的，早起的人低头缩肩，匆匆地走过，只有两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有一下没一下地收拾着冬青树间的杂物。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候，气氛冷清而僵硬，全然没有现在晨练的火热场景。后来我坐在台阶上，向西边张望，希望彭康能在那里出现，让我有个与他说话的机会。

过了许久，一群人从大路上转过，急急地向这边走来。站起来，先是看到前面两个人，接着看到四个人抬着什么，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连走带跑，不时磕撞着路边的冬青树。到了面前，前面两个人让开，我看清了，后面的四个人抬着的原来是彭康。彭康脸朝下，四肢被四个戴红袖章的人拉着，悬空吊在那里，头无力地搭拉着，随着那四个人的脚步晃动。到了台阶前，四个人松开手，彭康被扔到地上，动也不动地瘫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出面向我说明情况，一个红卫兵扔了一句，还不老实，装死！就一窝蜂地走了。

在那个没有王法的时代，恐怕即便警察在场也只有喘大气的份，没办法的！何况我是个西贝货，自不敢出面干预。

看着他们转过冬青树，顺着大路向西走去，我急忙下台阶去拉彭康。彭康校长软得像滩泥，怎么也拉不起来。我只得跪在地上，把他的头抱起来枕在我的腿上，然后双手掐着他的腰向上扶。这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软软的，全然吃不上力，似乎沉极了。正在无奈的时候，打扫卫生的两个妇女过来，一个人把手伸在他的鼻下试试，轻声说，死了！一时我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没反映过来，瞪着眼，傻傻地看着她，她又重复说，死了。这次我听清了，头嗡地响起来。一把把彭康校长推到地上，冲进宿舍，到组长床前，边摇晃，边喊，快起来，彭康死了！

组长听到彭康死的消息，一骨碌爬起来，随着冲到外面，看了一眼，又回到房里，急急地喊起其他的人，七手八脚地把彭康抬回去。多年后，一个同学回忆说，他起来时，看到一群人围着躺在床上的彭康校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大家都没有了主意。组长拨开众人，向门外冲去，边跑边喊他去找医生。

我们焦急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到门口向西张望。大家的血液仿佛凝固了，时间好像凝固了。

好不容易看到组长和一个人过来，急急地进了门。那人走到床边，拉开彭康的褂子，在那苍白的肚皮上抓了几下，肚皮上显露出一条条无法消褪的白白的条痕。这时那人急了，回过头说，快拿急救针！组长回头对我说，这个医生没想到彭康会是这个样子，他是下夜班回家顺便过来看看，没拿药。你跑去医务所要急救针，快！

我一路不停地向医务所跑去，要了急救药，又急急地冲回来，这时彭康校长身体已经冰凉了，急救针已经没有用了。我们的老校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最后倒在了“革命”者的手中。

那是清晨发生的事，中午校学校领导就来人拿走了彭康校长早晨去请罪之前吃剩下的半块饼干和喝剩下的水，尸体也拉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了。

之后的几天，平静而沉闷，无聊无奈等待着。彭康校长的死讯在校园里已经流传开了，乱哄哄地流传着各样的说法。听说彭康校长的死与什么案件有关，中央对此很关心。某天，一个不愿意报姓名的同学电话中告诉我们他所看到斗争彭康校长的情况。那天，他在中心楼，看到一群人喊着口号，在电机实验室那儿推搡着彭康校长，有人在彭康校长头上打了一

拳，彭康校长头就低下来，身子慢慢瘫软，这群人围上去，喊得更凶了。过了一会，人群散开，四个人抬着彭康校长向东门去了。一个在东一楼的同学也在电话中说，他看见四个红卫兵抬着彭康校长的手脚向东门走去，彭康校长的头低垂着，一步一摇，好像不行了。

彭康校长平日很注意着装，即使是挨斗的时候，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中山装，扣好每个扣子，领上的风纪扣也不忘记扣上。我们议论，也许就是这个风纪扣害了他。在他挨打后可能只是晕过去了，那帮红卫兵把他脸向下抬着，头深深低垂下，呼吸不畅，他本有患肺气肿，很可能因此窒息而死亡。

大约过了十几天，通知说要火化彭康了，让我们派个人去。谁去干这件为黑帮送丧的事？别人都是红卫兵，亲不亲阶级分，岂能干这样的事！我反正是黑五类子弟，干不干都是狗崽子，于是我主动承担了到火葬场去的任务。

火化那天，西安殡仪馆来车接人。我走之前，问王涟，在处理彭康尸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想法。王涟默默想会儿，慢慢地说，他穿有一件毛衣，大概有六成新，还有那双胶鞋，也是新的。把毛衣、鞋以及袜子带回来。我一边听一边想，她不缺这些东西，可能是留下这些东西作为纪念，或是作为日后的证据。

先是到西安医学院，那是解剖彭康校长的地方。“保护”小组去了我一个，任务明确简单，去火化场取回骨灰。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看那阴沉着面孔很威风凛凛的样子，好像是些什么领导。我跟在他们后面，进了一间阴森森的房子，里面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的气味。房中间一个大台子，上面盖着白布。靠边的长长的一排矮柜子，一溜排着三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肠子内脏一样的东西。一位医生模样的人过来，拉开台上的白布，对着那几位围在台子边的领导说，这是彭康。指着那三个玻璃瓶说，“内脏全部取出来了，装在这里面。”他边说边拉开罩在彭康身上的布，露出肚皮，从下巴到小腹最下处，整个肚皮上有一条缝住的切痕。“现在肚子里装的是麦草，”他边说边用手在肚子上比划了几下。移动了几步，他指着彭康头部说，“后脑取了三条切片，保存起来了”。我站在领导们后面，觉得心阵阵收紧，面对着台上这具瘦小的尸体，一时反应不过来。心中自问，这就是彭康，这就是原来我敬佩的校长？文革前，听高年级同学讲过他的革命故事，哲学家，文学家，革命者……，这在我心目中竖起了一座神圣的丰碑。平日我见不到彭校长，但是每当学校有足球赛，就会看到他。他总坐在靠近体育馆一侧球场旁边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两包香烟，看着球赛，抽着烟，一根又一根。他虽然并不高大魁伟，可是，远远看去，他身上仿佛闪烁着光环，不由得赞叹道，这么瘦小的身子里，竟然蕴藏着不可估量的能量和学问，想起“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句子，不由得感叹，真丈夫也！现在躺在我面前的他，一只裤管被卷到膝盖，一只裤管在脚脖处向上翻着；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穿着绿色的胶鞋。瘦小、苍白、干蔫，比之我在60年代困难时期所见过的路边弃尸尚且不如。房间里的人，都沉默着，静悄悄的，寂静如磐石压在人们头顶。久久，还是那位作介绍的人打破如死的寂静，说可以拉去火化了。

殡仪馆的人搬进来一个长盒子一样的东西，翻开四边，把彭康的尸体放在盒底，四边的木板竖起来，盒子成了具棺材。领导们已经退出去了，我赶紧找王涟要的衣物。在靠近柜子的地方，找着了灰灰的毛衣，卷了卷夹在腋下。一只草绿色军用胶鞋穿在脚上，自是不能脱下，另一只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好放弃。

领导走了，彭康的尸体装上了车，那是辆大卡车，殡仪馆的人和我都爬上去，站在棺材盒子旁边。



汽车一路开去，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想问。车走了好长时间，进了一个院子。院子周围荒极了，地里密密地排列着一个个的小土堆。我想这些小土堆可能是埋骨灰的地方。

火葬场里已经有了安排，彭康来的比较迟，排在第四个。看着他们把彭康的尸体盒子放在大厅里，一时还不能进炉，我们就在那等着。

在我们前面火化的是个姓贺的。小车把他推过来，揭去盖在身上的红布，让亲属检查。看去挺福相，身下垫着厚厚的洁白的褥子，穿着一身黑呢子衣服。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位姑娘，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扑向躺在那里的尸体。两个人训练有素地挡住了她，她无奈地哭喊着，挣扎着，慢慢软软瘫在地上。一位像是她母亲的妇人，眼睛红红的，和几个人一起把她搀走了。

在铁轨上行走的铁车，载着尸体进了火化炉，尸体猛地一弓，小车乘机被抽出来，尸体和身下的铁板留在炉里。炽热的火和强劲的风，舔着新被褥和呢子衣服，把它们化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灰），飞舞着随风向上飞去，仿佛是一群黑色的蝴蝶蹁跹起舞，伴送灵魂离开这不安宁的世界。

接下来，就轮着火化彭康了。简陋的木盒子被推过来，彭康直接被抬出来，放在小车的铁板上。敞开的上衣没有人替他掩上，卷起的裤筒一长一短依然如旧。与那姓贺的衣冠楚楚相比，这个颠倒的世界几乎一切都疯狂而无序，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哲学家、文学家、革命长者，竟然如此惨不忍睹地任人摆弄。

进了火炉，一样的弓，一样的蝴蝶飞舞，在这里，没有级别之分，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宠辱之分，灵魂被无常引向何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大约半个小时后，骨殖从炉里被扒出来，火化后的骨头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混放在铁板上冷却。工人过来问，这些骨灰用什么装？是全部带走还是只带一部分？我想骨灰不能丢失一点，应全部带回去。于是，我去前面柜台买骨灰盒，售货员听说是给彭康用，好说歹说，坚决不卖。无奈之余，请示学校。回答曰，买块布包回来。因为没有白布，只得买了块红绸布，到后面看着工人把骨殖研成骨粉，全部包起来。

殡仪馆的车把我和彭康的骨灰一起送到东大街，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事只能由我自己处理了。现在记不起是谁的指示，让我在街上买一只瓷瓶，用来装骨灰。在东大街商店（靠近新华书店，现在已经拆了）里，我看着货架上摆成一排各种各样的瓷瓶，头脑渐渐清晰，捉摸着应该买只稍微好一点的瓷瓶以慰彭康校长在天之灵，就选了最贵的一只，蓝底青点——他已经不是红色的了，还他一个清白吧！

回到学校，我把红绸子包着的骨灰、瓷瓶还有毛衣给了王涟，告诉她，鞋只剩一只，没有拿回来。她照旧没有任何表示，默默地接过东西走了。几十年过去了，彭康校长英名已经恢复，不知道王涟是否还健在，瓷瓶和毛衣是否还保留着以使后人记住那个苦难的岁月？

彭康死后，学校通知看守人员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防范王涟自杀。我想王涟是不会自杀的。知道彭康的死讯时，她没有哭，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喃喃自语：“他走了，他走了……。”经历过革命战争九死一生的考验，多次政治运动磨练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咬着牙坚持到底，搞政治的人只要不死，终有一天看到乌云褪去太阳东升的时候。可是学校的命令终是不敢违背，怎么加强防范，成了一个难题。最后，彭康校长房里的一套围棋，使大伙来了灵感。请她来下围棋！一来可以替她解闷，分散注意力，二

来也便于监视。当时，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同学承担。这真是十分尴尬的事情。王涟忍受着铭心刻骨的痛苦，不得不下楼来与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学生们下围棋；而我们打着下棋的幌子监视着刚刚失去丈夫、年龄比母亲还大的白发人。好好的一种文人逸士的高雅活动竟然成了革命的利器！这种尴尬一直继续到电制63班去上海实习才结束。

电制63班要到上海电机厂去实习。那天我拿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彭康住所，王涟看我收拾行李，奇怪地问我们去哪里。当她知道我们的去向后，忍不住对我说起她儿子的事。她和彭康有两个儿子，都是抗战时期在山东生的。因为经常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就分别送给两个农民收养。解放后，一个儿子和那个收养的农民都找不着了；另一个儿子被找到了，在上海交大上学，应该在67年毕业。可是，突然来临的文革打乱了一切，自他们当了黑帮后，两年多了，音讯断绝，死活不知。彭康死时没有掉泪的王涟，怎么也压不下母亲的天性，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虽然她说的很简单，我却听得很心酸。多年的阶级斗争，经常的划清阶级界限的压力，使我深深体会那种剜心之痛是多么辛酸难言。这就是革命？！

王涟的诉说打动了，我问清了她儿子的名字，在校时的专业班级，答应去上海时帮她寻找。可惜，我的善良与警惕不相称，理想与能力不相称。我没有注意在我和王涟谈话时，身旁还有其他人，他告发了。当天吃过午饭，我的车票就被收走了，被留在学校，参加电机试制工作。

同学们从上海实习回来不久，开始毕业分配前的整肃工作，我被“揪”出来。我被质问的有三条，一是，为什么用红绸包彭康的骨灰；二是，为什么答应替王涟转材料（王涟曾说，彭康死前有许多话要跟组织说，我答应替她把这方面的材料转上去。事实上，她没有写过一个字，我也没有再问过）；三是，为什么要为王涟找儿子。为此，我背着一袋黑材料和“不宜使用”结论进入社会，去了水库工地，

彭康死去已有40多年了，西安三兆火化场已不再是原先那样荒草凄凄，火化彭康校长时遍野的小坟堆被清理得干净，平地而起的绿树红瓦，相映生辉。不知晚上月明风清、夜深人静之时，是否可以听到枉死冤魂的长吁短叹。文革旧事已渐渐淡去，想回忆都是困难的。巴金未遂的遗愿，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因为“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巴金的想法触动了某些人的痛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想法生前无法实现而成遗愿。想来今后，要想实现遗愿恐怕也难。

彭康校长死了，一代豪士，风流英雄，却被几双污手抓着，拽扯着，搓揉着，死得不如市井小民。豪情何在？风流何存？

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原谅他的不肖弟子，他们纯净的灵魂是因被邪恶所俘虏而犯下了罪恶；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法轮常转，以惨烈死亡的血为不肖弟子洗清污染了的灵魂。

~~~~~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中）

• 阎 淮 •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三、四两节）

###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1966～1970年）

#### 第三节 云贵保省委，回京反文革

##### 3-10、“敢死纵队”大战云贵

1966年9月初，我们工物系9位干部子女，打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南下敢死纵队”的旗号，赴云贵保卫其省委，因为哥们徐沙的父亲（原二野干部）建国初曾在那里担任省领导。

我们到达云南后，立即与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取得联系。云南支持省委的群众拟成立全省的红卫兵总司令部，反击北京和当地造反派的反动行径，阎和秦请我们协助筹备。9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广场召开数万红卫兵参加的“红总司”成立暨保卫省委誓师大会，党政军要员讲话支持。宣读红总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厅长之女王海燕。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们清华红卫兵50人的盛况，以及《人民日报》支持我们“八二四”壮举等清华红卫兵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会后保守势力大振，省委和军区在保守派红卫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势。我们“敢死队”首战告捷，随即转战省委告急的贵州。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与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后被逼自杀，被定为叛徒。阎留下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周总理闻讯后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不该死呀！”我闻讯后，对刚刚全力保卫过的阎“叛徒”之死无比悲痛，对曾经无比崇敬过的陈江“首长”之举格外不满。

离开昆明，其他几人直抵贵州，我与四川籍同学先去成都，与周总理派的“首都一司西南挺进纵队”联系。我们分工：“一司”在成都保卫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敢死队”在贵阳保贵州省委，一方失利、对方支持。

贵州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省委书记贾启允1965年上任刚一年多。陶铸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信任，我们当然要保！二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9月起连发数信，反对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视。李是1955年的上校，1960年升大校。我认为，级别高低标志着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区区一个校级军官竟敢反对中央四号人物陶铸肯定的省级党委，我们跟你死磕啦！

66年9月下旬，在贵州省委大楼的两侧，出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两个据点——北京“三司”几百人炮轰省委的指挥部，我们“敢死队”九人保卫省委的办公室。当地百姓诧异：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都是造反的，怎么你们是“老保”？起初我们人少势大，在各高校联络，并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团结在敢死队周围，使贵阳成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随着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李再含，我们很快失去优势，贵州两派呈胶着形势。9月底我向成都的“一司”求救。

10月1日，贵阳国庆大会。省委给外地来黔造反和保守两派红卫兵各30张上主席台的票，宣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省委知道“敢死队”加上北京来的中学“老红卫兵”一共才20多人，全都上了主席台。而“造反派”几乎要百里挑一，才能上台。我们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听转播北京天安门大会实况，传来林彪的讲话“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宣判保守派的死刑，我如五雷轰顶浑身“拔凉”，痛苦知晓大势已去，我

们不待散会就溜回住处。下午造反派召开庆祝大会，殷勤地邀请我们讲话，我只能高悬免战牌。

当晚，广播《红旗》杂志13期社论，更详细具体地批判了“保守派”和“走资派”，明确支持“少数派”，我预感广大干部和干部子弟要倒大霉了。我规定的禁止抽烟喝酒的纪律顷刻瓦解，几个中学生喝得烂醉，大哭大闹、大叫大骂：“他妈的，中央把我们出卖了！”第二天，“一司”大队人马抵达，我对他们说：“你们是总理官派的队伍，还可以抵挡一阵子；我们民间的不行了，要撤了。”用“一司”的名义，我们订了火车票，打着“一司”的旗号，灰溜溜地逃回北京。

一篇社论就这么厉害吗？请看总理联络员刘西尧的回忆。周总理当天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他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到了1967年2月，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件旧事，质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周恩来传》下册，1915页）由此说明：这篇社论的重要，总理和我这个草民一样“忧心忡忡和耿耿于怀”。

新华社记者肖健卿在《贵州文史》2010年第二期《贵州文革初期琐记》中写道：“据说，大约在9月间，一位副省长的儿子，从北京一大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在贵阳各高校串连，大肆宣扬省委的业绩，特别说明贵州山地居多，少数民族比例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为了活动方便，省委领导还向小分队，优厚地提供了活动经费和场所，提供了宣传车辆。北京小分队不负父辈的希望，活动也很有成绩。不久，‘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口号，就呼喊出来，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了醒目的标语。随后，贵阳的造反组织奋起反抗，用大字报揭露这个北京小分队的内幕，并针锋相对地呼喊出‘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口号。”

此文基本属实，只是肖记者暗指的副省长陈璞如（文革后任铁道部长）之子，中国科大的陈金城与“敢死队”活动无关，陈只在我们回京后，表示感谢；在我们倒霉时，表示慰问而已。

1967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镇压了中学老红卫兵组织“联动”后，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贵阳敢死纵队被列为“高校联动”，图文并茂地被展览示众，并注明“革命干部的杰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汇报时，点了敢死队的名。清华造反派说，“你们被永远地、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文革后整党时，自认为此举应上光荣榜；1986年我抨击时弊鼓吹政治改革时，认识到保省委也是无意义的闹剧。

我们反对的李再含却留下一段佳话：他任贵州革委会主任后，让群众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口号之后，加上“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副总理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此事属实。姚监复是《赵阳最后的岁月》和《陈希同亲述》的作者，他在网络上说，此事是纪登奎亲口对他所言。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华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们红卫兵名存实亡。在云贵和北京惨遭滑铁卢后，我对中央文革极度不满，对文化革命彻底失望。原来认为运动是对着少数有问题的干部，现在感觉不对了。毛泽东说：“要打倒一切。”林彪说：“文革就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啊，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干部队伍，我们是螳臂挡车无力回天！

脱离城市无聊的造反与保守，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此想法在清华无人响应，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101中的同学。我们计划从南向北、从富向穷走遍中国农村。11月初，坐火车到广州后，背着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来到番禺县乡村。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了一个月，两个党员、两个转业军官（65年哈军工划归地方），四个干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受了大罪、长了大进。当我们回到广州，准备转战湖南时，听说清华红卫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意识顿时被激发，我不能缺席，应该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新的战斗！

### 3-11、与陈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月中旬我回到清华，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称的“十二月黑风”已被压制。留在学校的老兵头头，大多卷入后被整肃，清华红卫兵遭遇灭顶之灾。

前文提到的我当年的《检查》中，写道：“12月下旬，我和没有卷入‘黑风’的红卫兵总部委员及我系低班的干部子弟接触，想重新把清华红卫兵拉起来，与蒯大富继续斗，好好干一场。”我用主席诗词安慰“黑风”后被江青点名的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清华造反派头头如今这样认识：“所谓‘十二月黑风’是青年学生对中央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抵制与抗争。也是经历了半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之后，对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47页。）

我要补充，清华红卫兵刮起的“十二月黑风”，“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那雄那尔”没有实现，干部子弟主导的“老兵”却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

12月26日晚，应中学老兵朋友的邀请，我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大会。在“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和“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声中，压在我心里三个月的阴霾一扫而空。其后他们的标语“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我极为认同。

1967年，我们蓄芳的来年到了！

“1月6日下午，我和没赶上‘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晚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了，说他清醒了，不能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7日中午。”（引自1967年3月我的《检查》）当时在《检查》中被隐瞒没敢讲的事实还有：1、在我们四人议论中，批判指责最多的是江青，在原稿中也婉转地小批评了她一下。最后定稿时冷静了，删掉江青，加重对关锋和戚本禹的批判。2、是宋克荒提议署名“布尔什维克”，我们一致同意；认为江青反对我们保守的多数派，我们就是要打出多数派的旗号，和她对着干。3、我们三人骑车回清华，我们的毛笔大字都写得不好，宋克荒找他们班某同学抄成大字报；怕连累他，只有我们三人去张贴。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冷冷清清、公安部不该抓联动、中央不应压制多数派、整十二月黑风错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导陈宋阎三人于7日贴出反动大字报。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清华文革亲历》98页）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几篇支持的，但更多的是反击和批判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内斗激烈，没有精力过多地关注我们，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引起的波澜，风平浪静了。

1967年1月中旬，我们在清华没戏演、没戏看了，于是搞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开始了两个月的滇浙苏三省、逍遥派的不革命的游山玩水“大串联”。在昆明附近玩够后，因得不到东进的车票，曾滞留在春城。通过关系我们进驻“停业”的九三学社“省党部”赋闲。友党欢迎我们——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看门护院，当地的小红卫兵不便骚扰。其间我对三个朋友更加了解。陈元整天在图书室阅读马恩和列宁选集，闲暇时向我们宣讲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机钻研摄影技术和艺术，并拿我们开练。徐沙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唱机和唱片尽情欣赏古典音乐，还教导我们如何听懂交响乐。既无艺术细胞、动手能力又差，宋和陈无法让我开窍，我就只能陪太子读书、和陈元寒窗苦读马列了。陈对我启蒙，让我学习原来一窍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我们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开讲辞》说：“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老黑一逗（号）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涤荡我的灵魂。我和陈元不断背诵给宋和徐听，尽管经常遭到嘲笑。半个世纪后重温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长句，仍倍感亲切。聊以自慰的是：我未“牺牲在现实上很高的利益里”。下半年，我和陈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使我的精神再次升华。

2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必须回校闹革命。我们3月初从苏州回到清华，噩运等待着我。

### 3—12、被造反派专政和抄家

“3月16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发表政策声明，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八九派，打击反革命逆流。号召造反派杀回各班去，展开楼道战、宿舍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八九反动思潮。造反派在许多班级组织了对铁杆八九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强迫他们做检查。”（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86页。）

在清华的“三月镇反”中，我这个工物系“八九红卫兵”的一把手，又写过“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理所当然地成了系里第一号反革命，被专政了。具体待遇是：

- 一、行动受限制，不得擅自离校，校内不许与“八九派”接触。
- 二、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万人大会，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三、系里开了若干次我的批斗会。校系批斗会和单独逼供信，我只被按头、并未挨打，即只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否则肉体受不了，灵魂就出窍——我肯定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早节不保。真心感谢文明的造反派同学！

四、两个同学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间，搜走我的日记和笔记等物品。当时父母还未倒霉，子弟先于干部被抄家，这是为干部子弟中的特例。

五、被迫书写数份、共二万余字的检查大小字报，张贴于系里。这是我文革中仅存的宝贵资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诚挚地感谢造反派。

六、禁止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4月10日，清华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大黑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陪斗。我这个小反革命不够陪斗的资格，但又怕我这个保皇派破坏，当然不能让我去现场，可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宿舍看守我，失去千载难逢看热闹的大好机会。于是，4月9日，两人押送我到校门递解出境，勒令我11日晨8时不早不晚准时回校报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难”。

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生命没危险，爱情未来到，只为自由故，二者无可抛！”失去自由了一个月，我要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义的生活。当时的三里河、现在的中央行政区，十几个部委所在地，老红卫兵的天下，看谁敢来物资部大院抓我？

4月14日，巨大喜讯传来，不是伟大领袖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华“四一四”成立，井冈山分裂为“蒯大富的团派”和“四派”。当权造反派的分裂，无疑是被压保守派的福音。“镇反”无疾而终，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动解放了！如果说，对文明“专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谢是事后认识的“马后炮”；那么，对“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则是彼时的“当头炮”，当时真想放炮竹庆祝。

#### 第四节 社会底层调查与博览内部群书

##### 3-13、四省会调查结交刘泽彭

1967年5月6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规模武斗，死数十人、伤数千人，全国震惊。随后，两派众多人马来到中央公关，关于此次武斗的经过和责任众说纷纭。陈元、宋克荒和我决定去实地调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艺的孙巨（无线电系、李井泉三子过继给三机部长孙志远）为我们用圆萝卜刻制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印章”（我称是公刻私章）、用长条肥皂印制了井冈山的介绍信。大串联已结束，无“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食宿，我们通过来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与自控系雷同学去成都，住在他家。

在成都详细调查“五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认识到：在伟大领袖宠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对文革不满的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地区，战斗（不只武斗）和死伤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将惨败。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庙留下的食宿借条，宋克荒分别署名清华“蒯老富”或“蒯少富”。

游览之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我们遇到自动控制系的老友刘菊芬和刘泽彭。下山后，刘泽彭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家村”变成“四人帮”，我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我反对“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毕业后年年春节回京探亲都要聚会。文革后，刘先任

克荒之父、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秘书，后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外界戏称是主管党务的陈云义子。我被陈元劝到中组部后，是宋父的部属，刘的同事。我们四人的生活轨迹就这样交错缠绕。

6月，在成都郊县调查完毕。我认为再次免费外出机会渺茫，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地理势能优势，沿回京铁路线继续调查。我们四人皆为长子，他们三人担心“走资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处境，要直接回京。于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郑州、保定（河北省会1966年5月由天津迁到保定，1968年2月迁至石家庄）三个省会考察文革、了解社会。陕豫冀三省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的对立都很严重，零星武斗不断，但是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凭借信用度较高的清华学生证（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冈山”印信），我在两派的驻地和阵地穿梭。为了取得信任便于了解情况，我不时违心地分别表示同情和支持双方对立的观点。实地调查后，我为他们的真诚而悲哀，更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文革半年后，因为广大干部和我们保守派的境遇而怀疑文革；一年后，因为我们同代青年、他们造反派的伤亡而否定文革。

陕豫冀，既无中学同学在读高校，又无大学同学在此居家，父母战友也都自身难保。我无处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学期间家长每月发我20元“学资”，交饭费15元，还剩零花5元，算是“富农”。文革后经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积蓄，升级“小地主”。但是正如葛优所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我小地主进大城也不能住酒店呀。在三省会，我住过大车店、睡过大通铺，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过几宿。在那里结识了三教九流，接触了社会底层，尽管没有看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样水深火热，但我见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听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当学徒、初中毕业上技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原以为那是些学习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这里是四世同“室”，我走进贫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干群官民天壤之别，我们兄妹四人住校，平时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住四室一厅一百多平的局长单元；更别提北京哥们家的部长四合院，云贵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楼！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难忘。请勿翩翩联想，当时没有平民的“性服务”，只有“平民性”的服务——浴室晚上结束洗浴业务后，花两毛钱可在温热混浊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个澡，再在2尺乘5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个觉。在车站半坐半躺几晚后，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琼浆中尽情享受，身旁的两青年搭讪。赤裸着赤诚地亲切交谈后，首都大学生和河南游民有了点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随新朋友整天行乞、偶尔行窃。

他们高超的顺手牵羊，我毫无察觉。事后他们向我炫耀战利品，我劝诫：勿因小失大，砸饭碗进局子。他们答：警察忙于大革命，无暇小治安。晚上，按约定我管饭（打卤面），他们管睡。“晚宴”后，我把随身的辎重（换洗衣物及雨衣）和细软（十几元巨款及手表）花5分钱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跟他们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请来全国第一个林副主席的“四个伟大”题词，在被我们推倒的二校门处，敬立了全国第一座领袖看门塑像。郑州也学清华、赶时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静。攀上约20米长乘10米宽的平台，我把塑料凉鞋枕在头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宽阔无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气也格外清新。在初夏习习凉风中，“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事情。”丐友们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当晚经引荐，我结识了几位“老大”，第三日我随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盘实习。晚饭，老大们非要宴请清华“状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宴后，同样夜宿高台，别样的是，



他们坚持要“听我讲现在的事情”。无奈，吃人家嘴“长”！我神侃京城内外文革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这伙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个世纪先听到上文诸事！

两天三夜情之后，浴室邂逅的二位，执意赠送我5分钱的站台票，依依不舍送我上北去的列车。当互道再见时，我们都知晓：再见——不到了！清华大学只教了我两年有限的理论基础课，社会大学却教了我无限的人生专业课，在众多的导师中，这些丐友在时间序列上无疑位列前茅。这些课程使我增强了平民意识，在干部子弟中更显异类。

### 3—14、博览众书，文体并举

1967年6月，中央紧急指示：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革。而当时清华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内斗，我不感兴趣、也不敢兴趣。7月至12月，我在清华园里度过半年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气矿炸爆，一片火海。32111钻井队殊死搏斗，6人牺牲21人烧伤，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名噪一时，被誉为“英雄的32111”。回答外地朋友询问，我说正享受清华32111的幸福生活：三饱二倒一书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饱吃好，午觉夜觉不少；晨读书暮游泳，晚上围棋桥牌学会了！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有饭吃。不敢说吃饱——粮票限制；不能讲吃好——钞票限制。我真想说、但不敢说大师傅们“伟光正”，然而他们确实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选”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毛选”不许午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16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没人管的颐和园去野游。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以及所有文革升迁者。我还篡改了毛诗《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利健康”，风物“不”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深”，观鱼胜过“大会堂”！——见识高过南书房！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赐、后被邓没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108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1967年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90%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224页）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清华图书馆。管理员们不像半个世纪前，那位在北大只干了四个月的润之同行，那样具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他们和清华所有的职工（不包括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最平凡”（其实是“最低下”的别称）的岗位上，为“吃喝玩乐读们”服务。

1967年夏，我首先通读了建国以后全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手册》年鉴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约数千万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阅读了内部书籍中全部政治类的“灰皮书”和文献类的“白皮书”。书籍来源除了父亲收存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高干子弟好友，还开辟了胡乔木侄子和胡绳之子等清华同学的新书源。对我影响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对残暴的斯大林和专制的苏联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与毛及中国对照。

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让我对社会主义开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共和国人民与帝国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兴亡》是徐沙带我去北大历史系，向他四中学长胡德平借的。胡讲：“父亲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我答：“会像对和氏璧一样爱护。”阅后当然完璧归胡。

公开发行的《九三年》理所当然地让人对比“六六年”，此二书使我从历史和世界的全新视角审视文革。“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阶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确，我不知晓；人道主义“绝对正确”我认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

1968年1月4日凌晨，清华发生武斗，双方伤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疗。33年前，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创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失去蒋校长的清华也“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愿干武斗的部分造反派和不愿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纷纷卷铺盖离校，北京学生回家、北漂则投靠文斗学校的老乡。

2月4日除夕半夜，宋克荒突闯我家。他说：回沈阳探亲，父母被关，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哥们你了！宋在我家住月余，后投奔没倒霉的某将军。因文革中来家避难的朋友较多，此事我已忘却。40年后宋故事重提，说当年救他一命。我答：“举手之劳，言重啦！林彪之亡和小平之殁，你都冒险在第一时间通知外地和国外的我，才是义气千秋！”

1968年春，我读完所有能淘到的“内部书籍”中以苏联文学为主的“黄皮书”，主要来自系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书库。印象较深的有：《苦果》是“苏联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国右派反官僚和特权的俄文版；爱伦堡的《解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渴望中国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营让我震撼！我认为它是后来获诺奖的《古拉格群岛》的缩本。

而后，我精读了翻译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卷精选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几十部精品的精彩章节。阅后按图索骥，我千方百计找寻国内出版的完整译作，在知识和精神上接受双重洗礼，完成工科生的人文涅槃。

1968年初，我挚友顾逸东之母（顾准之妻）自杀，我和徐沙住进顾家数天，帮助料理后事。然后我们陪顾家兄弟与文革初父亲自杀的李海文姐妹等，骑车游遍北京远近郊区的名胜古迹、风餐露宿寻古探幽。这也算是这个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吧。

### 3—15、河北农村深入考察

1968年4月23日，清华武斗升级为战斗，由冷兵器进化为热兵器，由零星械斗发展成持续战争，史称“百日武斗”。文革前，清华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如水利系参加密云水库的施工，我们工物系参与核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的运行。我无奈地调侃：“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样的，不忘记清华传统，武斗都真刀真枪地干！”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战歌，唱道：“拿起笔来作刀枪，批判反党大黑帮！”我说造反派是：“拿起刀枪来作笔，砍向同学好兄弟！”

近期返校已无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顾逸东三人到河北安新县同年级党员何建坤（文革后任清华副校长）家乡，继续我1966年的农村考察计划。这里恰巧既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大跃进的模范县。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的贫困还是让我震惊，我们穿的最破旧衣服还像是农村的华服。第二天我们藏起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机没敢露头（该知之事有大喇叭整天喊）。与当年去广东大相径庭。那次公社干部对社员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首都红卫兵，到农村劳动锻炼和传经送宝。”我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状，参加过“忆苦思甜会”，但对17年历史的阴影一无所知。在红太阳照耀的红海洋中，向阳花般的公社社员哪敢向红太阳的红卫兵讲“困难时期”的负面故事。这次，我们不是红卫兵洋学生，而是邻家二小子的同学哥们，随着同学叫二爷爷、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里大官的娃娃，跟咱土农民挤一个土炕、啃一屉菜窝头、喝一锅稀糊糊，白给队上和咱自留地干活，还要给钱和粮票。这仨娃子不赖！”有这样的赞美，你什么心里话听不见、什么真实情况了解不到？

文革中我没有朝圣井冈山和延安，但听说“老根据地”的贫困，现在亲眼看到“中根据地”和“大跃进模范县”现实的穷苦。“昨日进城去，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似乎是中国农村的咏叹调和主旋律。农民讲述在并无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己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听。我这才知道：遍野饿死者，皆是种粮人！

之前在城里，我们曾讨论过共产党最对不起谁：“镇反”的地富反坏？“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冲击的干部？贫穷的工人？现在在乡下，我终于有了答案：农民！是根据地节衣缩食养活了红军八路的老区农民！我们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锦衣玉食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土农民；是分到土地踊跃参军牺牲、“解放”全中国的新区农民！百万战死内战沙场的农民是烈士的主体，纪念馆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盘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全国公有化农民！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仍在贫困在线挣扎的二等公民——农民！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

~~~~~

## 【各抒己见】

### 对施害者和受害者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以北京大学为例谈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评价

· 舒 声 ·

近年来的文革历史研究中，对各个群众组织的评价文章很多，大都笼统地进行否定，认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都是派性的产物，因此应各打五十大板。笔者对这种简单的评价方式不能苟同，认为对文革的群众组织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文革中广大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活动，由于观点相同、利益诉求相同而自发地成立各种组织，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组织有大有小，存在时间有长有短，所处地位不同，最终结局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文革中北京大学的群众组织为例，谈谈个人的看法。

#### 一、北京大学文革中的群众组织

北大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都是干部或教师，1966年7月底中央文革首先来到北大赶走了工作组，支持聂元梓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成为北大的权力机构，统治北大一直到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时间长达两年多。1966年11—12月，北大成立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群众组织，如《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等，对林彪、中央文革提出怀疑，也反对聂元梓的独断专行，但很快受到校文革的打击，其成员被抓捕或批斗，组织被迫解散。1967年2月1日，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组成了《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2月15日，《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哲学系教师，大字报作者之一）、卢平、刘冲、孙月才（研究生）、李长啸等，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以系编号命名，例如数学力学系为红一团，物理系为红二团，等等。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作为《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代表，担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为副组长，这就是所谓的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

1967年3月，北大校文革开始“整风”，由于聂元梓不接受群众意见，反而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学生，北大陆续成立了一些批评和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主要有《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樊立勤）、《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胡纯和）、《红旗飘战斗队》（负责人牛辉林）、《北京公社》（负责人陈醒迈、赵凯元）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谢纪康、王桂琴）。其中，《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人数较多，约有4000—5000人。7月3日，《北京公社》、《红旗飘》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发出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通告》。1967年8月17日，以上五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在五四运动场召开成立大会，总部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谢纪康等11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派代表或来信祝贺，接着《首都红代会》宣布接纳《新北大井冈山》为其成员，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正式形成。

#### 二、北大两大群众组织与校文革的关系及其主要分歧

《新北大公社》是在校文革支持下成立的，其负责人也是校文革委派的，实际上是附属于校文革的、被校文革控制和利用的群众组织。而《井冈山兵团》是由几个在批评和反对校文革的观点一致基础上联合成立的群众组织，所以两大群众组织的主要分歧就在对于校文革的态度上。1967年10月23日《井冈山兵团》的报纸《新北大报》发表《关于彻底改组校文革、按系、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严正声明》说：“目前校文革只能代表我校两大派中一派的意见，实际上是一个派文革。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必须立即彻底改组校文革”。同期，还发表题为《彻底改组校文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评论员文章，说：“现存校文革是由聂元梓一手操纵的，拉拢亲信，排斥异己，几经清洗修补完成了的，由聂孙地下常委控制的独立王国”，“完全是和新北大公社两位一体的派文革”，它“早已把自己降为宗派小集团和纯粹的派文革”。

而新北大公社认为“承认校文革、支持校文革、加强新北大的红色政权是实现大联合的原则问题”（1968年2月15日《新北大》社论），认为“校文革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企图颠覆这个政权，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2月22日《新北大》评论员文章）。

由于校文革掌握了北大的各种权力和资源，又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承认和支持（聂元梓本人就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而《井冈山》只是一部分群众的自发组织，二者处于完不平等的地位，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强者，《井冈山》是弱势群体，这是当时十分明显的态势。

### 三、校文革对《井冈山》的镇压和打击迫害

文革中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在校内竟然遭到几千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自然十分恼火，必欲除之而后快。她和校文革利用掌握的权力，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打击、镇压《井冈山》。

#### 1、造舆论、告黑状，抓“坏人”，安后台，抓“黑手”

聂元梓利用其地位和能经常见到中央首长的有利条件，递交了许多污蔑井冈山负责人的黑材料。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10月5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揪斗戈华的严正声明”，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刻把戈华交出来，斗倒，斗臭”（新北大公社多次声言，戈华是井冈山的黑高参。）

1967年12月3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将支持《井冈山》的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戈华从南口抓回北大。

12月14日，《新北大》发表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孔（繁）、杨（克明）、牛（辉林）、侯（汉清）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是走资派、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

12月20日《新北大》发表“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的文章，说“其要害是充当关（锋）、王（力）、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企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刊登“坚决把红旗飘中的坏人统统揪出来”的文章，称江青说了“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同日，还发表题为“打倒派性，揪出坏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由反党集团把持的极右势力，必须打垮”要求对方成员“打倒派性，揪出坏人，造反下山，加入新北大公社。”此后，以校文革常委王茂湘为首，掀起了一个“下山运动”，威胁利诱，动员《井冈山》成员下山，并在《新北大》上大肆宣传其成果。

## 2、绑架、抓捕《井冈山》成员，私设监狱，殴打致残

校文革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到处在校内外到处抓捕《井冈山》的成员，抓住后就送到私设的监狱中严刑拷打，1968年3月27日他们将反对聂元梓最坚决的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绑架到44楼，动用酷刑，用竹签插入十指，铁钉钉入膝盖，烟头烫伤腹部，3月29日凌晨把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扔出楼外，被《井冈山》人员发现，送往北医三院抢救，免于死亡，但造成终生残疾。技术物理系63级有3名《井冈山》成员被他们抓去，残酷殴打，其中郭某某被打断腿骨，女生周某某被殴打后精神恍惚。地球物理系教师彭秋和被绑架后，蒙住双眼，用铁棍殴打，和他关在同一地点的邓朴方（并非井冈山成员）也被同样殴打逼供，无法忍受，于1968年8月16日下午1点被逼坠楼。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假造电报，引诱《井冈山》成员到丰台火车站接人，趁机抓捕，技术物理系65级学生俎栋林当场被抓获，遭到严刑拷打，腰部受伤，至今仍留有后遗症。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还派出大量人员到外地抓捕《井冈山》成员，哲学系五年级女生韩琴英已经怀孕，从上海被抓后其丈夫一再恳求他们手下留情，但仍遭到殴打，致使流产。他们还在外地抓捕了井冈山总部委员徐运朴、《红旗飘》成员王忠林、屈长江等，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写下“认罪书”，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

## 3、发动武斗，围困《井冈山》，打死三人

聂元梓和校文革见他们所使用的种种手段不能达到消灭《井冈山》的目的，便策划发动了武斗，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高云鹏、黄元庄、黄树田、宫香政等。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袭击了《井冈山》人数较多的化学系宿舍31楼，身穿黄棉服、手持长矛、铁棍的武斗队将楼中睡梦中的《井冈山》成员赶了出来，被赶出者大多只穿了背心裤头，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还派人在校医院大门把守，不许伤者进去。

此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将《井冈山》在校人员围困在几个楼里，断水、断电、断粮，并发动几次武斗，打伤多人。更为严重的是，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于4月19日打死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4月27日用长矛刺死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打死。

## 4、制造“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案件

聂元梓和校文革为了彻底摧垮《井冈山兵团》，制造了一起所谓“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案件。

1968年4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组成“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先后抓捕了颜品忠、韩琴英、徐运朴、王忠林等10多名师生，严刑审讯逼供。1968年5月9日，《新北大》刊登《新北

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5月13日《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5月22日，《新北大》发表《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点了一批人的名，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5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3个多月，逼迫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787—788页）。6月27日《新北大》发表《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第三号公告》，将原“红旗飘”的9个学生点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或“骨干分子”说“这是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7月4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批斗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大会，将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等三个学生揪上台批斗。7月11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发布《关于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北京大学纪事》，789页）。

实际上，所谓“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聂元梓和校文革无中生有，认为制造出来的假案，他们借《新北大公社》总部之手发布所谓1—3号公告，并抓捕部分所谓“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反映出他们残忍、凶狠的专制行为。

#### 四、如何评价北大校文革和两派群众组织？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后，接管了校文革的权力，两派群众组织也各自宣布解散。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回忆道：

1969年3月24日，由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85人组建的8341部队的队伍开进北大，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的情况，不断地综合向毛主席呈送。待情况明了，毛主席说“可以表态了”之后，由8341去北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王连龙通知全校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参加的大会上表了态，用事实狠批了聂元梓（毛主席称她为老佛爷——当时社会上的叫法）和校文革的极左行为。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毛主席都看了。自表态后绝大部分群众是高兴的，但“老佛爷”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又拿出过去的小本本来，说谁谁曾经支持他们，讲过什么话，他们是听毛主席话的，等等。

主席看了这些简报后，让工作人员打电话把我叫回去。主席让我拿笔、纸做记录。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么？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氛，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不几天，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几万师生员工的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197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校文革在后期实际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这一结论，也成为当时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实际上是对校文革的彻底否定。

近年来，聂元梓和她的一些拥护者，如胡宗式（新北大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动态组长）、宫香政（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之一）、王复兴（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负责人）等人在其回忆录和网刊文章中千方百计地对校文革进行美化，为其评功摆好，实质上是企图为聂元梓和校文革翻案，这不但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也是枉费心机的。他们在评价北大两派组织时各打五十大板，造成“错误人人有份”，不分是非，对批评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文章，则一律指责为“派性”，甚至污蔑《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持起来的”，更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

本文的第三部分说明，在北大文革中，校文革作为掌权者，处于于强势地位，对反对它的干部师生和群众组织，一直是打压，甚至进行残酷迫害，他们是施害的一方；而《井冈山》的成员是一群无权无势的普通群众，一直处于弱势，他们是受害的一方。他们不畏权势，坚持正义，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专制行为，阻止了聂元梓对北大“一统天下”的美梦，应该得到肯定。《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支持和控制的群众组织，其中少数人（武斗骨干和监管人员）在校文革的指使下，批斗、审讯、殴打过干部、教师 and 不同意见的学生，造成部分人员死亡和残疾，应当负法律责任，而绝大部分成员是没有责任的。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把北大文革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推到群众组织头上，否认自己和校文革的责任，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原来的两派群众，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经过四十多年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北大的原两派成员，应该共同进行深刻反思，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吸取历史的教训，让文革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